

大国仪仗新风采

专访解放军仪仗队和解放军军乐团



请扫描
二维码, 观看
大国仪仗新风采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樊永强、王东明、白洁、郑明达)从增加女兵方阵到调整仪仗动作,从重新编排乐曲到改进表演服装,从提升欢迎氛围到彰显中国特色——在6日举行的欢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访华欢迎仪式上,多项迎宾礼仪改革后精彩亮相,展现出大国仪仗崭新风采。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承担了这次国事访问欢迎仪式改革的重要任务。近日,在紧张备战改革任务间隙,这两支堪称“三军封面”和“军队名片”的“司礼部队”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规模更大,气势更足” 全面彰显国威军威

三军仪仗队女兵由13人增加到55人,军乐团行进表演由43人增加到61人,仪仗队总人数由151人增加到224人……

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全新亮相的国事访问欢迎仪式以空前的规模和恢宏的气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规模更大,气势更足。”解放军仪仗队大队长韩捷说,这次欢迎仪式改革,仪仗队增加了人数、调整了队列、改进了动作,进一步提升了仪仗队气势,烘托出庄严、隆重、热烈的欢迎气氛,全面彰显了国威军威。

韩捷介绍,仪仗队队形由之前的每列4人、每方阵11列改为每列6人、每方阵9列,仪仗队总人数由此前最大规模时的151人增加到224人。

仪仗队中首次增加了女兵方阵是这次改革的一大亮点。相较于此前13名女兵与男兵混合编队,这次改革大幅增加女兵人数,将55名女兵单独编成方阵,排在陆、海、空军三个男兵方阵之后。与男兵每个方阵为单一军种不同,女兵方阵中陆、海、空军三个军种各占三分之一。“这样可以更好地展现女兵巾帼不让须眉的飒爽英姿。”韩捷说。

作为广受关注的“三军封面”,仪仗队男兵平均身高为1.86米,女兵平均身高为1.76米。在这次改革中,为了进一步增加仪仗队气势,分列式时仪仗队员的踢腿高度由原来的30厘米提高到35厘米,动作显得更加舒展、大方。仪仗队员所穿军靴鞋底使用硬牛皮并适当增加铁钉,分列式踏地声音更加响亮、气势更加雄壮。

从视觉到听觉,让人耳目一新

作为欢迎仪式中的重要一环,军乐团队列行进表演也进行了多项改进。最为明显的是,行进乐队的服装由红色上衣、白色长裤、金色腰带改为藏蓝色上衣、白色长裤、白色皮鞋、白色腰带和佩章,变得“更加帅气,更加富有时代感”。

解放军军乐团团长张海峰说,这次改革,军乐团重新编排了吹奏表演队形,人数由43人增加到61人;同时改进乐队指挥动作,减少抛指挥杖,队形变换更加稳重大气;改进《歌唱祖国》乐曲编配,体现时代感、仪式感和行进感。

“室外行进间演奏不同于室内演奏。”张海峰说,此前军乐

团行进队只有43人,背对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乐队的声势和感染力还有所欠缺。改革后行进队人数增加,还新增了木管乐器,增加了大号的数量,同时重新编排了乐器位置,“由单声道变为立体声”,“确保乐队的演奏层次更丰富、声音更浑厚”。

一场完美呈现的欢迎仪式,离不开仪仗队和军乐团的密切协作。

“军乐军乐,首先是军,然后才是乐。”军乐团三队队长黄艳辉说,为了与仪仗队完美配合,参加队列入行进表演的61名乐队队员从军乐团全团选拔,平均身高都在1.80米以上,这样就与前面走过的四个仪仗队方阵更加协调,“整个视觉效果,显得更加简单、干净、利落”。

“配上重新编排的《歌唱祖国》和新的表演服装,让迎宾仪式更有律动、更富时代感。”张海峰说,“从视觉到听觉,都让人耳目一新,展现出新时代人民军队的蓬勃朝气和崭新风采。”

“全天候司礼部队”呈现“最好的欢迎仪式”

参加完6日下午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张海峰被现场的热烈气氛深深感染。

“我们呈现了最好的欢迎仪式。”张海峰说,“身处现场,国家的自信、民族的自信、军队的自信油然而生。”

作为解放军军乐团第10任团长,张海峰多次参与了国家外交礼宾改革的设计论证。

解放军军乐团自1952年7月10日扩编成立以来,圆满

▲这是6月6日在欢迎仪式上拍摄的三军仪仗队。目前,仪仗队总人数由此前最大规模时的151人增加到224人。

6月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记者在现场发现,与此前相比,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多项内容发生了新变化,让人眼前一亮。

据了解,这是经过改革后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的首次启用,充分展示了新时代大国外交新气象、新作为。

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

完成千余次外事任务,成为国家和军队的一张“靓丽名片”。“解放军军乐团是全国唯一一支在一天24小时中任何时候都演奏过的乐团。”张海峰说,和解放军仪仗队一样,解放军军乐团堪称是“全天候司礼部队”。

“再平凡的东西,练好了就是绝招。”在解放军仪仗队训练处处长朱振看来,新的欢迎仪式,对仪仗队员的要求更高、标准更高,训练上就要更加精细、更加刻苦,“确保每一次任务都保持最佳状态”。

“作为司礼部队官兵,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感受着国家荣光、民族荣誉和文化自豪。”解放军军乐团编导刘新波说,“外国领导人来到中国,第一时间看到的中国军人就是仪仗队和军乐团官兵,我们的表演,既代表了中国军人的形象,也展示着中国艺术家的素养。”

与改革同行

向着更公平、更有效率不断推进

2018年6月5日,17岁的上海考生顾昕伟和同学们一起来到校门合影,定格他们的青春记忆。再过两天,他们就要迈入高考考场。

“和爸爸妈妈、师兄师姐一样,高考将成为我们难以磨灭的记忆;但和他们不一样的是,我们的高考其实早已开始,而不仅仅是这两天。”顾昕伟说。

作为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首批试点省份之一,上海的学生除了参加语文、数学、外语3门传统高考科目外,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选择不同的科目组合,进行“选课走班”;外语考试一年两考,择高分计入成绩;贯穿高中学习生涯的“综合素质评价”也在高校招生中参考使用。

事实上,作为我国的核心教育制度之一,高考制度不仅为改革开放选拔出优秀人才,其本身也在国家发展中不断进步,在人民期待中不断前行,在40多年的不断探索中实践着改革精神。

从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到改变成绩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再到为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必要支持条件和合理便利……高考制度在恢复之后一直处于变革与调整过程中,始终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作出完善。

目前,以上海、浙江为代表的改革试点正在完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考方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为“不拘一格选人才”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为全方位考查考生的特长和潜质,一些高校在自主招生中力求为学生提供“一个舞台”,而非“一张考卷”。

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自主招生考场,“漫画图解对想象力是促进还是抑制”“谈古诗词中的物理现象”“产生酸雨的原因及危害”“食品中的增塑剂与人体健康”等富有思辨、贴近生活的灵活考题,让那些善于思考、注重知识积累的考生感到“过瘾”,成为展现他们综合素养的平台。

“改革高考制度,也倒逼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改革,让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更加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看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从过去的资源驱动、劳动力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模式,需要选拔培养侧重基础研究和强化高技能的两种人才。

“与改革同向同行,高考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红利。”夏学民说。

(记者胡浩、周畅、魏梦佳、吴振东)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开启人才成长之门

与时代同行的高考改革

一次破例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解决77级的考卷用纸……从主张恢复到正式考试,不断破例彰显着恢复高考、改革人才选拔制度的决心,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最好例证。

“高考确实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影响极为深远,不仅是对考试制度的恢复,更重要的是抓住了一个重要的把手,用一个杠杆撬动整个社会变局。”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戴家干说。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由此改变。“我们的前途就这样与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1977年,21岁的赵政国还是湘西山沟里的一名车工,如今,他已成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

转折就发生在高考。1978年,赵政国走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近代物理系77级学生。多年过去,他不仅自身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还培养了多位高能物理领域的优秀年轻人才。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从此恢复正常,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程方平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

人人皆可成才

为改革开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不论家境不论出身,人人皆可成才,正是高考的公平所在。改革开放40年,通过高考这扇大门,亿万莘莘学子迈入高等教育殿堂,毕业后为国家奉献智慧和力量。

在北京大学东门附近的理科楼里,中科院院士、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平文仍清晰记得,年少的他为减轻家中负担,走街串户卖冰棍的情景。因为家境贫困,一家人全靠父亲种田糊口,张平文几乎不敢憧憬自己的未来。

1984年,高考成绩全省前十的张平文被北大数学系录取,从此开始探索数学的奥秘。

“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高考,很多像我这样农村地区的孩子可能走不出来,更不可能做学问。”他笑着说,那一年数学

最难,他“占了便宜”,全省平均分仅40多分,他考了108分。

多年后,作为数学科学学院学术带头人,张平文在复杂流体、移动网格方法及应用、多尺度算法与分析等多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所带领的科学工程计算系经过近20年发展也已枝繁叶茂、人才济济。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曾在1978年至1980年3次参加高考,最终考入北大。“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将不会有机会走进北大,在知识的世界遨游。”他说。

“高考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经历。”2009年,上海考生邵子剑参加高考,那一年正值梅雨季节,“天气又闷又热”,进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后,邵子剑和同学发起“言传远疆”在线教育项目,为新疆数所合作小学数百名小学生提供远程汉语教学。

“从目前来看,我觉得高考还是比较公平的一场考试,因为在考场上,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命运而奋斗。”他说,“如果没有高考,我或许不能感受这样广阔的平台和多彩的生活,追求自己的梦想。”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认为,高考虽然从表面上看仅仅是一项教育考试,但能否选拔出合适的人才进入大学深造,却会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深刻影响。

刘海峰介绍,恢复高考后3年入学的90多万学子毕业后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这批人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中国的经济起飞和高考制度有着重要的关系”。

教育部统计数字显示,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99万人,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1/5,规模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30%增长到42.7%,中国正在快速迈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考运与国运相连,高考制度与社会进步紧密相连。

“高考制度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科学、思想、法律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程方平说,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我国仍需冷静总结历史经验,针对问题继续探索制定更为科学的高考制度,“这是一项关乎民族未来发展及国家竞争力的严肃课题”。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不能不回望高潮。

高考制度的恢复,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曙光普照中国大地;

高考人才选拔机制,为改革开放注入生机勃勃的人才资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巨变的动力之一;

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逐步推开,牵引教育综合改革“发动机”持续运转,写就一份份浸润着改革精神的时代答卷。

知识改变命运

重启高考大门 拉开改革序幕

1977年8月初,还在安徽基层蹲点的程秉谦,忽然接到通知,要立即赶往北京参加会议,“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匆匆出发了”。

如今已87岁的程秉谦说,当时的他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会议,开启了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

在这场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上,与会者纷纷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得到邓小平明确支持。随后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最终确定恢复高考。

关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知识改变命运”的号角,从此响彻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与改革的时代潮流交相呼应。

作为安徽省最早的高校招生负责人,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程秉谦每天都忙于接听咨询电话。在他看来,这些频繁的电话背后,是人们对未来的希望,是基层为社会输送知识人才的渴望。

恢复高考,不仅恢复了知识的尊严,重新肯定知识的价值,也是撬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杠杆”。

持续40多天的招生工作会议,第一次破例在冬天高考,第